

日本东洋文库研究员初山明： 在简牍学、古文书学、法制史与秦汉史之间

整理/苏俊林 陈弘音 校对/游逸飞

2016年6月6日，诸位青年学者联合访谈当时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简帛文献研究中心访学的日本学者、中国简牍学名家初山明先生。访谈围绕“求学历程”“日本的古文书学”“法制史”“秦汉史”等主题展开，本刊选刊主要内容，以飨读者。

对我影响最大的教授，依次是永田英正先生、林已奈夫先生、樋口隆康先生

游逸飞（台湾中兴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初山老师研究领域比较广泛，尤其是研究中国简牍学的名家。我们策划这次访谈，希望您学问的整体面貌呈现出来，给有志于简牍学或秦汉史的青年学人提供借鉴。请您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求学历程，以及与日本东洋史学界诸学者之间的关系。

初山明：我个人的求学历程有一些复杂。我1953年在群马县的桐生市出生，当地以生产丝织品著名。我父亲是一个工匠，做和服的衣架。我大学考上信州大学，本来打算毕业后就回故乡继承父业。但我大学四年级时的导师是一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老先生，他要求我考京都大学的研究院，我意外地考上了。

1977年我考入京都大学大学院，从事东洋史研究，当时东洋史的课通常就是关于中国历史的课。我第一次参加的研读班是樋口隆康先生的研读班。樋口先生在中国、朝鲜、中亚等地区的考古学领域都十分出名，他本来是京大考古系的教授，退休以后去京都泉屋博物馆当馆长。这个博物馆主要收藏中国青铜器，共有200多件，大部分是商周时期的。当时樋口先生研读班里的成员，有些你们一定听说过。江村治树现在是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浅原达郎研究先秦金文与楚简；叶达雄是台湾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研究西周史；冈村秀典跟官本一夫现在是日本最有名的中国考古学专家；间濑收芳先生毕业后翻译了两本张光直先生的著作；还有松井嘉德、佐原康夫、角谷常子、吉本道雅、藤田高夫，都是著名的中国史研究者。对我的求学历程来说，这个研读班的意义最为重大。

除此之外，我还参加了几

个研读班，受的影响也比较大：

第一个是尾崎雄二郎先生的《说文解字注》研读班，读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参加这个研读班的人，现在我记得的是浅原达郎与平田昌司。平田现在为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中国语学。

第二个是川胜义雄先生的《通典》研读班课程，这对我个人的意义非常大。我第一次见到富谷至，就是在这个研读班。川胜先生本来不研究秦汉史，他研究魏晋南北朝。他跟法国的关系非常密切，会说非常流利的法语，早就关注欧洲学者的方法与观点，所以他对历史研究的感觉跟一般的中国史研究者不一样。

第三个是谷川道雄先生的《通鉴纪事本末》研读班课程。就在我上大学时，谷川先生从名古屋大学调来，成立了研读班。

这三个之中，《说文解字注》研读班对我最有用，可以从中了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独特的治学方法。

此外很重要的林已奈夫先生的研读班。林先生跟樋口先生堪称当时日本研究中国考古的“双璧”。我上大学时，林先生主办了“战国时代出土文物研究”研读班。这个研读班的研究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是研读《云梦睡虎地秦简》，第二是研读《周礼·秋官》，第三是成员的研究报告。为什么研读《周礼》？《周礼·秋官》关于司法的内容，跟云梦秦简的关系比较接近，对研读云梦秦简非常有用。所以，这一周研读云梦秦简，下一周研读《周礼》，轮流研读，中间穿插成员的研究报告。关于考古方面的报告非常多。研读班成员主要是京大文学部的师生，京大外面也来了许多非常有名的学者，比如佐藤武敏、吉田光邦、米田贤二郎、杉本宪司、永田英正、稻叶一郎等先生。我在这个研读班第一次见到永田英正先生，那时候他在富山大学，不在京大，在当时我还不是永田先生的研究生，但已经受了非常大的影响。

整体来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教授，依次是永田英正先

生、林已奈夫先生、樋口隆康先生。

游逸飞：以上的学习历程，对您的研究有何具体影响？

初山明：考古学的研读班对我影响最大。林先生主要研究的是先秦史，但他的兴趣与视野非常广泛。樋口先生则时常对我强调观察原件、原物的重要性。他调到泉屋博物馆以后，我们在博物馆里面继续举办研读班。有一天，他打开青铜器陈列柜，让我们上手商周青铜器原件。没想到商周青铜器看起来非常重，但实际上不太重，其制作技术相当发达，器壁做得不厚。

我受樋口先生等人的影响非常大，但是，我现在最关心的考古学跟他们的不一样。林先生的考古学，可以称之为文化史的考古学。樋口先生对田野考古最感兴趣，他爱发掘，不爱讲课。而我大学院毕业后，自己学习欧洲的考古学，受了欧洲——特别是英国考古学非常大的启发。他们称为“post-processual archaeology”，即“后过程考古学”。[整理者按（下同）：后过程考古学又称“后过程主义考古学”或“解释性考古学”，相对于20世纪中叶起非常流行的“过程学派考古学”而得名，兴起于20世纪中晚期。过程学派考古学认为，只要严守一定的科学方法，则可以透过考古学客观地复原当时的社会、经济和生态适应。后过程考古学则强调考古学研究中的主观因素，关注人类行为的意图与意义，据此来复原过去的社会现象。]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研究会，叫“中国史研究会”，这是在校外的研究会，现在好像还在继续。比较有印象的成员是岛居一康、渡边信一郎、吉田滋一、大泽正昭、足立启二、奥村哲、官泽知之这七位。渡边信一郎先生你们想必听说过，他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主要从事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我认为他是目前日本最好的中国历史研究者之一。

此外，我还去了西安的西北大学留学四个月（1981年9月—1982年1月），认识了林

剑鸣教授，还有周天游、黄留珠、张廷皓、余华青、徐文生、吕苏生等诸位。

古文书学不是纸上的学问，而是观察原件的学问

苏俊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我们知道日本的古文书学做得特别好，但对相关研究成果了解很有限，能否请初山老师具体介绍一下？

初山明：我研究的是中国历史，不是日本古文书学，无法在此展开介绍。我想谈一点，大约是在1990年代后半段，日本古文书学的研究潮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用一句话说明变化的方向，或许可以说是从书式、样式的分类转向政治、社会功能的研究。可以推荐一本书，年轻的学者佐藤雄基的《日本中世初期の文書と訴訟》（山川出版社，2014年）。他是佐藤信先生和村井章介先生的学生，东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这本书不厚，但内容非常丰富。他在绪论里对日本古文书学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文书的书式、样式不一定表示该文书所发挥的实际功能。这是非常重要的观点。

引用河音能平的《歴史科學運動と史料學の課題》（收于《河音能平著作集》第5卷，东京：文理阁，2011年）中举过的例子吧。如图，东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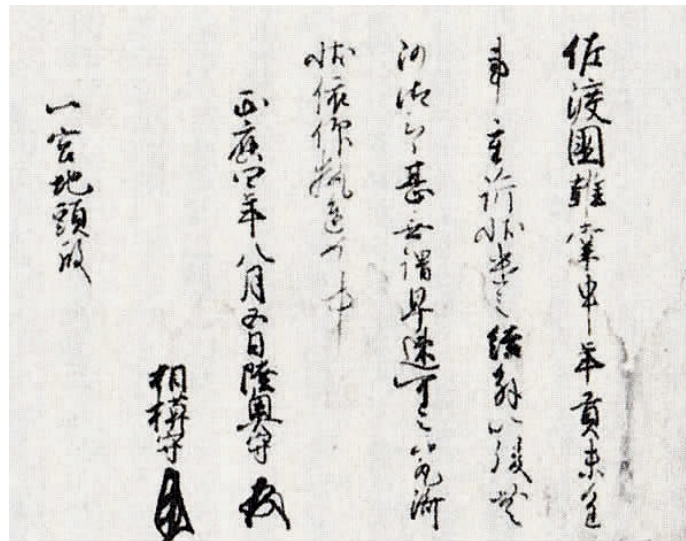
保存的《东寺百合文书》之中的一件《关东御教书》，日期为正应四年（1292）的，也就是镰仓幕府发行的下行文书。其内容为命令东寺领地佐渡国一宫的“地头（在地领主）”延迟收取“年贡（地租）”。在书式上，镰仓幕府为寄件人、一宫地头为收件人。按照常理，该文书应由收件人、也就是一宫地头保存。然而我们却在东寺保存的《东寺百合文书》中看到这件文书。学者认为这封从幕府发出的“御教书”，实际上并非由一宫地头、而是由东寺的“杂掌（负责征收年贡的东寺役人）”持有。东寺的杂掌带着这封“御教书”前去见一宫地头，监督年贡的收取。年贡收取后，文书并不交给地头而是直接带回东寺，将东寺对于佐渡国的权利证明保管起来。如此方能较好地解释以“一宫地头”为收件人的文书由东寺保存的现象。因此文书的书式不一定表示文书的功能。

游逸飞：如果我们想翻译日本古文书学的入门读物，供中文学界参考，您推荐的是？

初山明：最推荐村井章介的《中世史料论》（收于《中世史料との對話》，吉川弘文馆，2014年）。

苏俊林：能否谈谈目前日本学界中，应用古文书学的方

（下转11版）▶



关东御教书